

孔子“仁爱”观 与基督教“爱人”思想比较*

□林火生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 孔子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作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因此,认真对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仁爱 爱人 儒学 基督教

Abstract: Confucius view of “kindheartedness” and Christian view of “love people” i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kernel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 headspring of the world’s modern civilization. Thus, comparison researches about these two to get the cream of theme will be significant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ulture and the west culture.

Key words: kindheartedness, love people,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5)05-0634-03

在当代思想界,对中西传统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颇为流行,将“仁爱”或“爱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视为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的重要基础。这种情况不仅与“仁爱”思想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而且与“爱人”修养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有关。就此而言,比较研究儒学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对于理解儒学和基督教思想乃至中西传统文化的异同,反思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进行现代性的诠释,将是有所裨益的。

一、二者的主要异同

(一)二者的相同或相近之处

1. 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爱人”思想的含义相近。孔子“仁爱”是他整个学说的基础和归宿,也是其整个思想的内在核心。何为“仁”?孔子讲“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最基本的内涵,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首先要孝亲,从爱父母、爱兄弟、爱家庭做起,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是由孝亲扩展至社会上的一般人,展开成“泛爱众”,用爱心去对待别人,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境界。“爱人”思想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罗马人书》第十三章说到:

“爱人就是要成全律法,如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条令,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由此可见,爱人原则是基督教的一个抽象概括的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内涵就是要爱所有的人,爱上帝,包括爱你的友人甚至仇人,要爱人如己。正如《马太福音》中讲到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爱人,而不是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2]由上述可知,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要求用爱心去待人,尊重他人,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修养,其实质都是要求取消人们之间的差别,达到人我的融合统一,借以协调好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助。

2. 二者的重要地位及基本价值相似。“仁爱”观是孔子一生思想的内在核心,是它的集中精华。“仁爱”观作为一个核心的伦理道德范畴或体系,贯穿于孔子的整个学说,甚至于整个儒家思想之中。所以有人称孔子开创的儒学为“仁爱”学,或者说仁学是儒学的出发点,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统含了儒学中的绝大多数概念范畴,^[3]讲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及做人的基本学问。以人为

* 收稿日期 2005-02-25

作者简介 林火生(1979-)男,江西赣州人,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研究。

本,是儒学的最大特点。它蕴含较多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成份,对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西方中世纪一直被基督教所控制,基督教盛行并占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就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基督教有“三主德”,就是“信仰、希望和爱”;“爱”是最高德性,也是一切美德的源泉。^[4]首先要爱上帝就是至善。爱人如己,这被基督教称为“金律”。“爱人”作为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是一个最高层次的道德原则,是基督教的教义教规的源泉和出发点。

3. 二者的本质一致。二者都是封建的等级道德。孔子的“仁爱”观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进而要求庶民安分守己,规定了等级名分,区分了尊卑贵贱,从而成为封建阶级的统治工具。基督教要求教民爱上帝、爱神,学习神的德性,践履神的意志,而他们(统治者)就是教主,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或代表,目的是维护上天(神)的利益,但其实质就是维护地主、教会、僧侣等封建特权阶级和封建王权的统治利益,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因此,不管是从“仁爱”或“爱人”观各自理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观,还是从社会政治生活角度看,它们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和推崇,被视为那一时代精神的结晶和核心。

(二)二者的主要差异之处

1. 二者形成的渊源不同。孔子“仁爱”观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契机又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做了总结、升华和创造。“仁爱”观的产生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是在社会发展到显示“人”在社会生产和斗争中的地位与价值,开始承认“人”的生存权利时提出来的。再者“仁爱”观的提出也是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还未形成独立的意识,到了奴隶社会对天命和神的崇拜,而又转化为“尚德”、“保民”,封建社会,孔子提出“道”的社会原则及其理想,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把着眼点放在“人”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就是“爱人”的境界。^[5]因此,“仁爱”观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思想形态、主体意识上对“人”的发现与自觉。孔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春秋时代的社会实际而提出了这一思想原则。

基督教的“爱人”思想包含在其教约《圣经》中。我们可以从基督教本身的演变中找到“爱人”思想的渊源。基督教前身是犹太教,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罗马人入侵犹太地区后未能从现实中征服犹太人,不得不往精神上找出路,这为基督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除了社会根源外,还有思想渊源,那就是犹太教的教义和教规以及

古希腊罗马哲学。犹太教的教义在其《圣经·旧约》中,许多内容对基督教的思想都有明显的影响,如上帝创世说、摩西十诫等。此外,基督教还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思想,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斯多葛派的宿命论、泛有主义,且二者混合改造成为基督教思想,其中的“爱人”思想就是从中引伸出来的。一开始是下层犹太人提出的,而随着基督教民的发展壮大,罗马统治者对此由镇压改为利用,信徒也由下层变为封建主和富人。统治者打着“爱人”、“泛爱众”的旗号,以此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他们宣扬爱上帝(神),也就是要“顺服君主”的意志,并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化身)。而“爱人”、“泛爱”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同一。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人们互爱;“爱人”只能是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已。

2. 二者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不同。儒家的“仁爱”观作为修养论是实践的心性论,它的目标是“仁爱”的具体行经,通过主体由“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途经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要求积极入世;“仁爱”观与社会政治融合为一体,以调节人际关系(修身)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治国平天下)。它不仅研究体现自我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实现其实践价值目标。由“爱人”观转化为“爱人”的行动,把焦点投身社会,投向现实,在现实中去实现“爱人”的理想;“行仁爱”是“爱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归宿。孔子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如《学而》中提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而且提出与“仁爱”相关的各种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实践中实现“仁爱”观,^[6]“行仁爱”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实践活动。^[5]

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被教主宣扬为一种赎罪的行为。它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要通过爱上帝、爱人、“泛爱”,将自身与世俗生活区别开来,并认为与绝对本质相悖的现世人生是与生俱来的罪。^[6]“爱人”就在于以严格的诫律摒除尘世的贪欲之罪,通过“爱人如己”、“泛爱众”达到对上帝的爱。这是其终极目标。正如《马太福音》中讲到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你的神。”爱神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爱神总是第一位的。因此基督教的教义要求教民不断向上帝对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做忏悔,面对自己,清除虚假的朽臭,于是忏悔就成了人们赎罪的手段了。基督教的“爱人”将神圣和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宗教机构或宗教活动,以神圣或理想去抗世,企图超越尘世价值活动。这是一种消极离世的态度。它认为一切都要依靠上帝的启示和恩赐,因而其最终目的和归宿就是向上帝的归依。

3. 二者“爱”的对象有差异。孔子“仁爱”并不是一视同仁。由于“仁爱”观根本上是为适应宗

法等级的关系,以及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结构的,因而“仁爱”就有了差等性和层次性。仁爱的自然基础是血缘之情,包括父子女间的亲情,及向其他血缘关系推展,而血缘关系有远近之分,因此就有先后和等次之分。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亲的程度依次递减,由爱父母推至爱所有人的不同等级的排列。而且“仁爱”又要受“礼”的约束。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具有维护宗法等级关系制度的习惯性质,并以此规定等级名分,区分尊卑贵贱。因此,孔子的儒学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爱人”不是去爱一切人,更不是去爱奴隶,认为小人是不配讲仁爱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基督教的“爱人”思想是“泛爱”。它要求爱上帝、爱友人、爱仇人。它冲破了其前身犹太教,只爱犹太同胞、不爱仇人的有限性,而是把爱的对象扩展至全人类(信徒),成为一种泛爱主义。《马太福音》中记载,有一次耶稣正在对众人讲道,他的母亲和兄弟来找他,有人告诉他母亲和兄弟来了,他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的旨意的人,就是兄弟姐妹和母亲。”^[7]因此,按照基督教的理论,所有人,只要信奉教义,不论其国别、肤色、性别有多大差别,都是同胞姐妹兄弟,都是在爱的范围之内。这一原则后来被演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基督教的“泛爱”思想中,尤其是它要爱仇敌的主张,明显有别于犹太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原则,而基督教伦理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怀恶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合拿,……”^[8]因为不管朋友也好,仇敌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不能以牙还牙,而应用“以德报怨”的爱人原则来对待。

二、二者差异的原因探析

(一)二者的社会历史传统所演变。孔子的“仁爱”思想源于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观、宇宙观。“天人合一”理想成为追求向往的目标模式;“敬德保民”、“修德配天”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它要求对祖宗、上天有恭敬之心,对统治者自身要加强品德修养,而对民要实行仁政。“仁爱”思想就是从“尚德”观逐渐演变而来的,而儒家孔子更作了升华总结。以“仁爱”之观念和行径来反映“德”。提倡积极入世,在社会政治中去实现理想,由仁爱的内圣“转化为仁爱的外王”。而西方基督教“爱人”思想作为一种宗教伦理思想,必然有其宗教的传统和因素在其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

迫则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而对自然的迷罔和无知又是其产生的自然根源。因此宗教是侧重于人们心灵上的体验和回归,祈求神或上帝的恩赐和启示,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宗教机构和活动之中,希望以神和理想去脱离和对抗世俗,企图超越现实,回归上帝,侧重于内心的修养,达到对上帝的忘我的爱,将人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统一融合。

(二)二者思想文化背景所紧系。中国传统是小农经济社会,重视天然的血缘关系,血缘是维系人类之间关系的纽带,血缘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天然感情,而且血缘有亲疏远近之分,形成了等级层次,反映到社会政治上就逐渐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构成了古代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与君主专制统治之间形成了矛盾,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就得行“礼”,以“礼”来约束和规范人际关系。孔子“仁爱”观就不是泛爱,一视同仁地爱,而是有差等的爱,并以此来维系社会宗法等级秩序。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是泛爱,作为一种宗教,宣扬所有教徒都是平等的,只要入教尽心尽意去爱上帝,要爱上帝就必须爱所有人,包括仇人。宗教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来麻痹和欺骗人民,用“泛爱”来吸收招揽更多的信徒,以便稳固他们的统治。其实这种基督教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而达到的爱所有人是抽象的同一,爱所有人在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三、结语

孔子的“仁爱”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中西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源泉,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它们都是那一时代的产物,不免带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内涵,开始自觉到了人的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孔子“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汲取其中的永恒的价值,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对于中国的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2][4][6-8] 黄伟合. 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
- [3] 朱贻庭.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
- [5] 韩秀丽等. 四书与现代文化.[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